

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两次转向”及其当代效应

王雨辰 黄俊溶

摘要 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两次转向”是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和晚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回归。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反对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济决定论的解释出发,重视实践、辩证法和文化因素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后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思潮的主导下,利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中存在的缺陷,走向了完全脱离经济基础决定作用、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文化价值批判;晚期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式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总体批判,既深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又实现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转向。揭示和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两次转向”的实质,既有利于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逻辑和理论性质的认识,又有利于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

关键词 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转向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4)06-0048-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2AZD090)

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转换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即从关注重大经济和政治问题的主题转到关注“远离经济基础、位于等级制度最顶端的那些特定的上层建筑层次。换句话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典型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国家或法律,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1](P97)。学术界一般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也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转向。后马克思主义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发展为脱离经济基础的抽象文化研究,晚期马克思主义则回归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式和政治经济学研究,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构成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转向。如何理解和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两次转向”的原因及其实质,对我们弄清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与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的两种路向与实质

西方马克思主义缘起于对西方革命战略与策略的争论,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把这场争论的代表归结为自己和卢卡奇。这场关于西欧革命战略和策略的争论又进一步引发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争论,但由于当时共产国际用政治强力介入这场争论,卢卡奇被迫作自我批评,柯尔施因为拒绝作自我批评而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以卢卡奇和柯尔施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由此被当时的马克思主义阵营看作共产国际内的一个敌对的哲学流派。

之所以发生关于西欧革命的战略与策略的争论,根源在于 20 世纪 20 年代初西欧革命的失败。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西欧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西欧与俄国的社会结构和统治方式存在着区别。西欧社会

具有俄国所没有的市民社会,其统治是包括政治社会的政治暴力统治和市民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控制的总体统治,这使得无产阶级认同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出现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危机。这一方面意味着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不符合西欧的社会历史条件,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必须冲破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济决定论和教条主义的解释,并由此引发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争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在于其辩证方法,而不是具体结论,批评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种近代知识论哲学的做法,并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实质,只能钝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批判功能,强调应当立足于与近代哲学及旧唯物主义哲学的双重断裂点上,并从哲学方法论、研究对象和哲学的功能三个维度来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在他们眼里,从哲学形态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基础是总体性辩证法,而不是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自然科学方法,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哲学;从研究对象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历史和进入人类社会历史中的自然;从哲学的功能和使命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像近代哲学那样是为了揭示世界的绝对本质和普遍规律,而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基于上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一种现代形态的主体实践哲学,其功能和使命在于,通过揭示现实生活世界人的生存境遇,探讨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途径。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言,西欧革命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出现了危机,以及西方人在西方社会的总体统治下个人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的丧失,革命主体和革命的战略策略问题由此始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焦点问题。这就意味着,佩里·安德森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不再从理论上思考重大政治问题的论断并不准确。因为佩里·安德森所讲的理论与实践相脱离,并不能被理解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反映和反思实际,只能理解为理论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相脱离。而他们的理论之所以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相脱离,是由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着教条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指导思想,理论稍有不同就会受到批判,甚至被开除出共产党,这必然使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得不在党外发展,而丧失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联系。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就在于,立足如何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这一本体论的维度,反思西方社会的现实和政治问题,探索西方革命的主体、战略与策略问题,而这恰恰是西欧革命的重大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基于以上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主张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对当代西方社会展开社会批判、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以培养无产阶级成熟的阶级意识或个人的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为西方革命奠定前提。上述三重批判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的主要研究内容。但必须指出的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既存在着以探求如何实现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自由与解放的理论家,如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列斐伏尔、阿尔都塞以及一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又存在着以探求如何实现作为西方个人自由和解放的理论家,如法兰克福学派、萨特等。这两种类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处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关系问题上的理论基础和价值立场是存在着区别的。这种区别具体表现为:

以探求如何实现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自由与解放的理论家的理论基础是他们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是由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构成的总体所决定的。基于对西方革命中人的主观因素缺失的指认,他们重视实践、辩证法、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注重对人的主观因素的研究。上述理论家在强调人的主观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的同时,又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重视人的主观因素作用的客观基础,要求正确处理历史发展进程中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关系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仅以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观点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卢卡奇把物化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商品交换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和普遍化,这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把物化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现象和普遍现象;他同时反对把阶级意识看作人的主观意识和心理,强调阶级意识是“理性的适当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则要归因于生产过程中特殊的典型的地位”^[21](P107),认为阶级意识是由客观的经济关系决定的;柯尔施强调马克思主义理

论是一种包含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在内的总体性理论,并批评第二国际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曲解为经济决定论,忽略了哲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无法有效地指导西方革命,只有复苏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意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批判功能,才能重建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但柯尔施始终坚持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理论中的首要地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内在地包含了哲学和意识形态批判。“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组成部分——不仅包括对资本主义时代的物质关系的批判,而且还包括对它的社会意识的特殊形式的批判”^[3](P45)。葛兰西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实践哲学”,认为实践哲学的功能和目的就是要传播社会主义价值观,改变人们心态,最终夺取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他通过评论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手册》,反对以布哈林为代表的理论家对实践哲学的机械决定论、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解释;他又主张模仿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写一本《反克罗齐论》,以反对对实践哲学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解释,并通过区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物质”概念的不同,指出实践哲学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去研究物质的物理或化学属性,而是研究纳入人类实践中的自然如何影响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因而不能离开实践和辩证法来研究物质,研究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葛兰西在强调发挥实践哲学的文化价值批判功能的同时,始终强调应当处理好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指出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不是个人随意或理性化的主观意识,而只能被理解为经济基础的产物,即人们在其历史活动中对自己所处地位以及展开斗争的产物。他进一步通过评论卢卡奇对实践哲学的解释,要求正确处理历史发展进程中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作用的关系。在葛兰西看来,卢卡奇认为人们只能就人类社会历史而不是就自然来谈论辩证法。如果在他预先假定了自然一人之间的二元论的话,他这一论断就是错误的。葛兰西实际上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统一关系。但由于如何处理历史发展进程中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关系这一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虽然他们都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但他们并没有真正解决好这一问题。卢卡奇晚年在回顾和反思自己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时对此指出:“在二十年代,科尔施、葛兰西和我曾企图以不同的方式解决第二国际留传下来的社会必然性和对它的机械解释的问题。我们继承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谁也没有解决它,葛兰西也许是我们三人中最好的一个,但是他也未能解决。”^[4](P293)他们的理论弱点和缺陷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逐渐脱离经济基础展开抽象的文化批判埋下了伏笔。

以探求如何实现作为西方个人自由和解放的理论家的理论基础是人道主义哲学,他们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立足于人的自由和解放这一本体论立场,指认当代西方社会是一个总体统治和总体异化的社会,强调如何使当代西方人从被总体支配和统治的异化的生存状态下解脱出来,形成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是西方个人获得自由和解放的前提,并由此对当代西方社会展开社会批判、文化意识形态批判,总体来看,其理论经历了从力图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相结合,到逐步走向脱离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抽象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发展历程。霍克海默尔在《批判理论》(《理性之蚀》)等论著中,反对“传统理论”以笛卡尔的《方法谈》为基础,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和单纯描述社会,强调他主张的批判理论是“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5](P230),要求通过分析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文化维度,揭示极权人格是如何产生的,反对实证主义哲学脱离哲学形而上学,片面强调工具理性的作用,强调发挥哲学的社会批判功能对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重要性。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后来的发展越来越脱离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走向抽象的文化价值批判。这种批判体现为: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立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的“异化”和“人道主义”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反抗异化和人追求自由的抽象的人学,或者主张通过美学救世主义培养具有解放功能的“新感性”,或者主张通过人道主义的爱的培育形成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哈贝马斯主张借助语言学转向重构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商谈伦理实现社会共识,以克服当代西方社会的民主困境;霍耐特主张以黑格尔的承认理论为基础,为“承认而斗争”;弗斯特主张以康德主义的伦理为基础,为“正义而辩护”;罗萨主张建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强

调变革现代性的“完全掌控”的文化价值观,来克服加速社会的新异化;萨特则主张以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为基础,把人类社会历史看作一个反抗匮乏和异化的历史。探求如何实现作为西方个人自由和解放的理论家的理论的上述发展趋势,又决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所必然具有的负面效应。

二、后马克思主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的借用和错误引申

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广义和狭义意义上的解释。本文说的后马克思主义,是指英国学者拉克劳和墨菲利用后现代主义思潮解构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以激进民主和话语革命为主题的一股社会政治思潮,属于狭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拉克劳和墨菲认为,由于当代西方社会的社会结构是多元的、偶然的和有差异的,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统一的无产阶级主体已不复存在,这就决定了必须把以无产阶级主宰的阶级政治转向将不同政治主体的话语“链接”起来的身份政治,社会革命也因此被转换成以激进民主为主要内容的话语革命。拉克劳和墨菲就是利用后现代主义思潮,特别是后结构主义思潮,曲解和错误地借用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和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的历史观、意识形态理论来建构他们的理论的。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是受第二国际关于该概念争论的影响,对列宁的“领导权”概念的改造和置换的结果,卢森堡的自发性理论对葛兰西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卢森堡看来,与俄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和缺乏政治自由爆发革命不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处于分裂状态,工人运动源于群众的“自发性”。群众运动的自发性既与历史必然性规律相关,又与群众的革命意识、党的领导、工会的组织以及偶然性事件密切相关。拉克劳、墨菲由此认为,卢森堡的上述观点由于凸显了偶然性的作用而明确区别于第二国际的理论。这是因为,在第二国际内部存在着以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和以伯恩斯坦、索列尔等为代表的修正派的争论。“正统派”坚持以阶级同一性和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历史必然性规律为基础,探寻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而“修正派”则认为当代西方社会工人阶级并不是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的那样越来越被剥夺和日益贫困化,而是越来越在经济利益上走向分化,以经济必然性规律为基础的阶级同一性已经不可能实现,工人阶级的政治同一只能通过克服不同部分工人的阶级局限性来构造,经济与政治主体之间的政治裂缝会持久存在。伯恩斯坦主张借用康德的伦理学,通过引进一种伦理主体,诉之于伦理主体的自发性来终结历史决定论,认为无产阶级的优越性正在于它代表了正义和进步的观念,阶级同一性的实现有赖于经济与政治的进化得以实现,这使得伯恩斯坦能够把政治的自发性与改良主义、渐进主义的革命战略结合起来。索列尔相信经济必然性规律能够实现阶级的同一性,又通过引进伦理主体来克服机械决定论,既借用维科重视历史发展中道德力量的思想,又借用尼采的唯意志主义哲学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形而上学”,其特点是既注重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又重视无产阶级统一的阶级意识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并把阶级同一性建立在以“总罢工”为基础的阶级斗争中形成的无产阶级原本具有的最高尚、最主动的阶级情感上,索列尔实际上把构建阶级统一的构成因素从经济领域转向了政治领域。拉克劳、墨菲强调,索列尔的上述思想不仅用“‘偶然性’和‘自由’领域的基本原理代替了破碎的必然性链条,而且还有关于重构总体化作用的新领域、‘偶然性逻辑’的特殊性的努力思考”^[6](P40)。索列尔强烈的反经济主义倾向和对培育无产阶级统一的阶级意识的强调,既凸显了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也深刻地影响了葛兰西,因为葛兰西“历史集团”的概念正是“来自列宁的‘领导权’概念和来自索列尔的‘集团’概念得到了新的综合”^[6](P47)。拉克劳、墨菲指认阶级同一性问题是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思考和探索的核心问题,虽然“偶然性”逻辑不断冲击必然性逻辑,但在他们那里,“偶然性”逻辑始终只是必然性逻辑的补充,真正凸显偶然性逻辑的是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

之所以说葛兰西真正凸显了偶然性逻辑,是因为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是对列宁“领导权”概念的置换和超越。列宁的“领导权”概念强调以历史必然性规律和阶级利益一致、以阶级同一性政治为基础

的政治领导权,政党和阶级之间的关系是说服与被说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葛兰西的领导权则包括政治领导权和文化道德领导权两部分内容,他对列宁主义的置换和超越主要体现在:第一,葛兰西强调意识形态的物质性,破除了将意识形态仅仅归结为代表特定阶级的虚假观念的上层建筑式解读,而把意识形态解读为连接“历史集团”的一种有机关系的整体,并具体存在于制度和机构之中;第二,通过“历史集团”的概念和“有机意识形态”的论述,强调领导权阶级通过道德和知识分子展开意识形态灌输,超越了经济决定论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机械区分;第三,突破了意识形态还原论的观点。拉克劳、墨菲认为,葛兰西所说的政治主体是有机的“集体意志”,而不是真正的阶级主体,这就决定了掌握领导权的阶级所连接的意识形态要素没有必然的阶级属性。正是通过上述三重置换和超越,葛兰西颠覆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的解释,把关注焦点放在了文化层面,这有利于实现不同利益集团的结合,因而更能适应左翼力量分化日益加剧的西方社会。拉克劳、墨菲正是以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为中介,认为西方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多元政治主体的出现,使工人阶级出现了分裂,丧失了统一意识,以历史必然性规律为基础的阶级政治已经不可能,西方革命的关键在于如何把多元政治主体连接起来,展开以激进民主为主要内容的话语革命。但是,拉克劳和墨菲对葛兰西“领导权”概念的借用和引申恰恰是违背了葛兰西的原意,并解构了历史唯物主义。因为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既是建立在他的实践哲学基础上的,同时也是与他的国家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既反对对实践哲学的经济决定论和实证主义解读,又反对对实践哲学的唯心主义解读,主张从“哲学、历史和政治三者的统一”的原则解释实践哲学的内涵与特质,强调实践哲学的核心是要求科学分析由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所形成的总体是如何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并通过传播新的世界观,形成无产阶级统一的“集体意识”,最终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葛兰西提出的“领导权”概念正是以他对马克思哲学的上述理解为基础的。不仅如此,葛兰西提出“领导权”概念也与他的国家理论密切相关。葛兰西把国家划分为行使政治领导权的“政治社会”和行使文化领导权的“市民社会”两部分,强调夺取文化领导权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联盟和统一战线,为最终夺取政治领导权奠定基础 and 前提,指出不能脱离经济结构的变革,抽象谈论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斗争。但拉克劳和墨菲在援引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过程中,由于既没有看到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斗争必须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又没有看到文化领导权与政治领导权的内在关联,导致了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片面关注而陷入了否定阶级政治的失误中,并将葛兰西基于实践哲学对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的论述斥责为应当否定和抛弃的本质主义残余,并以此凸显其多元异质的话语革命策略。显然,这种做法既曲解了葛兰西的思想表达,也贬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原则。

拉克劳、墨菲还错误地借用和引申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的历史观、意识形态理论来建构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提出了“多元决定”的历史观,以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决定论和技术还原论的解释。拉克劳、墨菲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建立在三个基本论题基础上,即生产力决定经济运动规律、无产阶级普遍贫困化以及生产关系的变革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三个论题基础上。拉克劳、墨菲认为,这三个论题是一种经济主义和还原主义,应当予以否定和抛弃。因为并不存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由经济必然性决定的历史规律,当代西方社会的工人阶级已经破碎化为具有不同利益的主体,这就意味着如何把这些不同的主体结合起来是当代西方社会革命面临的首要问题。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历史观不仅突破了经济必然性观念,而且适应了日益多元性、差异性的西方社会,从而能够把多元政治主体连接起来。但他们又认为,只有剔除了阿尔都塞“多元决定”历史观中的“经济的最后决定作用”的本质主义残余,才能为把总体中有差异的各要素连接起来创造前提,这种借用和引申违背了阿尔都塞提出“多元决定”历史观的原意和目的,即为了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决定论和技术还原论的解释,必须既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起最终的决定作用,又坚持上层建筑因素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借用和错误地引申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是拉克劳、墨菲建构其

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霸权理论的又一途径。阿尔都塞要求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功能,并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指出意识形态是通过对人们的欺骗、想象、体验和行驶建构主体的功能,从而实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建构功能是通过主体进行召唤和质询,即通过意识形态对个体打招呼 and 对话,把个体建构为主体的^[7]。这个被意识形态建构出来的主体即便表面上看是自由的,但也从属于更大的主体,即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束缚的。拉克劳、墨菲正是通过借用和错误地引申阿尔都塞上述思想来建构其理论的,具体来说,就是拉克劳、墨菲改变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召唤和质询机制的内在结构。在阿尔都塞那里,意识形态召唤和质询机制的内在结构是建立在他对拉康镜像理论运用的基础之上的。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区分为宗教、法律、政治和伦理等具体意识形态,强调其功能在于维系不同阶级的利益;同时又认为存在着意识形态的一般,其功能就是通过召唤和质询机制,把个体变为表面上是自由的主体,同时又能够成为服从社会秩序要求的社会角色,实际上强调的是,意识形态通过召唤和质询等话语来实现来保证意识形态与主体的内在一致性。拉克劳、墨菲侧重的是意识形态的召唤和质询功能对意识形态本身的作用和影响,从而将阿尔都塞关注意识形态和个体的关系、关注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建构功能,转移到关注意识形态本身上了。因为拉克劳、墨菲关注的是意识形态如何通过政治实践,保证意识形态内部话语的一致性。实际上是把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中的具体个人,转换成意识形态的构成要素,意识形态通过召唤和质询对主体的建构转换为意识形态内部不同召唤与质询之间的相互作用,变成了这些不同召唤与质询之间是如何实现统一的。

可以看出,正是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的借用和错误引申,拉克劳、墨菲立足于后现代主义立场,既解构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又解构了马克思主义基于经济因素的根本决定作用基础上的阶级统一性,从而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完全转化为话语批判。他们断定,社会存在以及社会存在中的一切关系都是话语建构的结果,其发展变化不存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由内部矛盾所决定的必然性,而是社会多种因素偶然作用的结果,这种偶然作用决定了社会存在的差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经典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由经济因素所决定的历史必然性、阶级政治就这样被后马克思主义解构了。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告别了阶级的政治,把西方个人自由和解放的道路寄托在如何接合好当代西方的生态运动、城市运动、女权运动等各种新社会运动上,把社会主义的阶级政治转化为以话语革命为主要内容的微观革命,完全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基本原理。

三、晚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回归

晚期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式,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丰富和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的积极成果,对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和新矛盾展开研究,力图把由于资本的空间生产所形成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微观革命,上升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总体革命,探索无产阶级自由和解放而形成的一股思潮。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哈维、詹姆逊、伊格尔顿、奈格里和哈特等人。晚期马克思主义既继承和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的积极成果,又扭转了后马克思主义拘泥于抽象的文化价值批判的缺陷,力图把政治经济学批评与文化批判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回归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转向。晚期马克思主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的积极成果的丰富和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晚期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以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式为基础,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总体批判。詹姆逊在《辩证法的效价》一书中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辩证唯物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两种类型,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由恩格斯以科学和自然为基础提出的,并引发了关于自然辩证法的论战。这一论战涉及如何看待本体论和二元论等问题,这些问题在文化批判问题上体现为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矛盾和争论,他由此高度赞扬卢卡奇的辩证法对解决这

一问题的价值及意义。因为卢卡奇“自然地将外部世界看成历史进程,看成一个充满各种趋势的世界,这些趋势这样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外部世界,不管多么丑陋和令人沮丧,永远都不可能是无生气或无意义的,除非是因为它已经被历史地制造出来,已经在历史的生产中获得了自己的意义”^[8](P39)。在《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一书中,詹姆逊肯定了阿尔都塞结构辩证法的新意在于他提出了“问题式研究方法”,并认为它“能‘决定’在其范围内进行的思维活动,因为它可以说就是思维、思维给自己提出的各种认识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极限”^[9](P112)。“问题式研究方法”既能够辩证地处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又决定了人们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和人们认识问题的限度。在《政治无意识》一书中,詹姆逊在肯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说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科学方法论的同时,也指出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因果律的解释所导致的在阐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问题上的机械决定论的缺陷。詹姆逊既肯定了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历史观对表现性因果律的强调有利于克服传统马克思主义机械决定论的缺陷,又认为,为了避免使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与拉康等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以及后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同一化,必须采用一个关键的附带条件,即“只存在着一种结构的结构主义:即生产方式本身,或是整个社会关系的共时系统”^[10](P26),并通过分析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的总体性观念和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提出的总体化方法论的异同与特质,要求以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式为基础,对晚期资本主义展开社会批判、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伊格尔顿在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兴衰,在揭示卢卡奇意识形态理论的弱点的同时也指出,卢卡奇认为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造成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的断裂,只有坚持总体性辩证法,即“将历史作为整体把握,就是在其动态的、矛盾的发展中掌握它,人的潜能实现是该发展过程的一个关键部分。到这种程度上,一个特殊种类的认知——整体认知——对于黑格尔与卢卡契都是某种道德和政治规范。因此,这种辩证的方法不仅重新统一了主体与客体,而且重新统一了‘事实’与‘价值’”^[11](P241-242)。

第二,晚期马克思主义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发展为包括经济批判、政治批判和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在内的总体批判。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坚持总体性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坚持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式,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看作是由经济因素起最终的决定作用,经济因素和文化意识形态因素相互作用构成的总体所决定的。关于前者,詹姆逊通过把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是主体对其生存条件真实体验与想象统一的思想,与林希在《城市的意象》一书中关于构建城市经验既需要直接感知,又需要想象感知的辩证法结合起来,提出了“认知的测绘”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的实质就是要求把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认识与个人的具体境遇结合起来,展开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规划。哈维反对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强调应当立足于过程辩证法,探讨如何使由资本的空间生产所造成的反对资本的地方性斗争,上升为反对资本的总体斗争,并通过评论威廉斯的“战斗的唯物主义”,肯定他所构想的社会主义政治学是“由一个地方积极的团结经验塑造出来的理想最终一般化和普遍化为对全体都有益的新社会形式的运行模式”^[12](P37)。关于后者,詹姆逊一方面强调应当坚持政治经济学这一路径研究文化,并借助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的经济学理论,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为古典或民族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和全球形式的跨国资本主义三个发展阶段,全球形式的跨国资本主义也被詹姆逊称为晚期资本主义。詹姆逊划分资本主义三个发展阶段的目的在于依据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式,揭示资本主义发展不同阶段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文化,并由此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分别流行的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强调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转型的体现和文化逻辑。詹姆逊一方面认为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范式的鲜明特征是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也是它比其他关于人类历史解释模式更优越和更有效的原因。但另一方面,詹姆逊又指出生产方式范式更加注重的是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历时态研究,还需要强化共时态研究,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总体,这就需要援引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等理论资源,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式,并由此提出了“文化革

命”的概念,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展开包括经济批判、政治批判和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在内的总体批判。哈维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和工具理性批判,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自己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构想。哈维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反思和批判了启蒙运动以来的“支配自然”的观念,指出这种观念不仅造成了人类对自然的统治,也必然带来人对人的统治,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和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解决这种异化的途径就在于:一是要破除作为工具理性的实证主义科学,使科学建立在批判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的基础上,把科学发展与实现人的自由、价值和意义有机联系起来,恢复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二是要借助精神分析学和审美揭示人的欲望和需求被压抑的原因,为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奠定前提。哈维一方面肯定了法兰克福学派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以及对“支配自然”观念的反思和批判,对我们反思和解决当代生态问题的本质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也指出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真正解决人类与自然关系分离的难题,使得其思想在启发后世思想家的同时,也受到了后世思想家的批评,特别是强调其理论内部存在着诸如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批判工具理性和完全否定工具理性的虚无主义的矛盾,其结果是找不到解决“支配自然”观念负面后果的行动方案。这一困境的实质是法兰克福学派力图用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代替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动力的阶级斗争理论。基于上述认识,哈维强调,必须在坚持对工具理性批判的基础上,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通过反对资本主义总体统治的阶级政治,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和解。

第三,以马克思的生产范式为基础,丰富和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批判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列斐伏尔借助阿尔都塞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地形学比喻和社会空间再造的思想,提出了空间批判理论,开启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间转向。列斐伏尔既反对机械唯物主义的绝对空间观,又反对主观唯心主义的先验空间观,认为只能立足于生产关系来理解空间,由此提出了以空间生产、空间辩证法和城市权利为主要内容的空间批判理论。他的空间生产和空间辩证法思想主要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与空间相结合,形成了以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和再现性空间相互作用的“空间三元辩证法”,认为空间三元辩证既保证了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目的,又使得“在空间的地位与‘主体’的地位之间、在我思与所思之间,设置起了某种对立”^[13](P5),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对立和异化,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空间是不利于人的自由个性发展和解放的“无差异”的空间^[14](P33-40)。列斐伏尔由此强调,社会主义就是要建立有利于人的个性和自由全面发展的“差异空间”,并通过差异空间的生产,赋予主体进入都市的权利。列斐伏尔的空间批判理论对哈维的地理学—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哈维充分肯定了列斐伏尔凸显资产阶级是如何通过空间生产谋取利润和实现政治统治的意义,但同时也批评了他既没有看到资本的空间生产必然造成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结局,又没有看到因资本的空间生产所造成的工人阶级由于地理阻隔而拘泥于地方的微观阶级斗争的现实。哈维理论探索的目的,是通过建构地理学—历史唯物主义,揭示资本是如何与新自由主义结合,通过资本的空间生产谋取利润和实现其政治统治,并强调,正是由于资本空间生产所造成的不平衡地理发展,蕴含了社会主义解放政治学的可能性。承接列斐伏尔的空间批判理论,哈维以过程辩证法为基础,提出了社会过程决定空间形式的空间观,将地理学与历史唯物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分别提出了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时空修复理论和时空压缩理论等命题和理论,阐明了全球化时代资本是如何通过空间生产完成资本积累,既揭示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必然造成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结局,又揭示了当代全球化引发的诸如人员、技术、资金、生产的全球流动以及环境与城市空间布局的地理景观的重组等新问题,使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的斗争被限制在由空间生产所阻碍的狭隘地方性空间中,并使反抗资本的斗争呈现出微观革命的现象。由此哈维要求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并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时间维度、历史维度和空间维度有机结合起来,探讨将工人阶级反对资本的微观斗争,进一步上升为反对资本的总体斗争,把社会主义的微观政治学与宏观政治学有机统一起来,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工人阶级的自由和解放。

总体来看,晚期马克思主义坚持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式,坚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既坚持了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批判、政治批判与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又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回归。

四、国外马克思主义“两次转向”的意义和当代效应

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两次转向”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当代西方现实问题的认识和把握密切相关。西方革命的战略与策略的争论,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并由此进一步引发了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争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西欧革命失败的根源归结为无产阶级成熟的阶级意识的危机,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当代西方统治方式的变化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济决定论的理解,这使得他们的理论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具体说:第一个维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功能的追问,由此形成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第二个维度是分析当代西方社会结构和统治方式的特点及新变化,由此形成了他们的资本主义观;第三个维度是他们对西方革命战略、策略的探索和社会主义理想的设计,由此形成了他们的社会主义观。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维度也规定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和发展轨迹。要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两次转向”的实质、意义和当代效应,就应当考察他们对上述三个维度的问题的探索。

第一,国外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功能的探索。以探索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自由和解放为目的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种近代知识论哲学,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现代形态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强调应当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批判功能,揭示无产阶级的现实生存境遇,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社会批判、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以培养无产阶级成熟的阶级意识,实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探索作为西方个人自由和解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援引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等现代西方哲学思潮,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一种反抗异化和追求人的自由与解放的人道主义哲学。虽然其本意是力图揭示当代西方社会对人们实行总体支配和统治的具体机制,培育人的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为实现西方个人的自由解放奠定文化心理基础。但是,由于他们越来越脱离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抽象地谈论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必然无法找到实现西方个人自由和解放的现实途径,也为国外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走向抽象的文化批判埋下了伏笔。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其社会历史条件和传统文化来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功能不同,后马克思主义借口当代西方社会呈现出多元化、差异化的发展趋势,利用后现代主义思潮,特别是后结构主义思潮,并借用和错误地引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来解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必然性的规律,否定建立在历史必然性规律基础上的阶级政治,把马克思主义倡导的社会革命转换成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以激进民主为主要内容的微观的话语革命,从根本上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显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的负面效应。晚期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式,反对那种对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式的机械唯物主义理解,主张援引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思潮的积极成果,完善和发展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式,实现对人类社会历史展开历时态和共时态研究的有机统一,并主张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力图把因为资本的空间生产而造成的工人阶级地理隔阂的反抗资本的地方性微观斗争,上升为反对资本的总体斗争的社会主义政治学,最终实现无产阶级的自由与解放。他们的理论既是对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缺席的克服,又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积极成果的丰富和发展,显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的积极效应。

第二,对当代西方社会结构和统治方式的特点及新变化的分析。以探索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自由和解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坚信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立足于上述认识,他们都认为当代西方社会存在着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二分,资产阶级既通过政治社会的暴力统治,又通过市民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控制,对无产阶级实行总

体统治和支配,且统治方式越来越依赖于文化意识形态控制,形成的无产阶级成熟的阶级意识对西方革命至关重要,并由此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批判、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形成了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和阶级意识理论、柯尔施的总体性理论、葛兰西的国家理论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与空间批判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理论、消费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晚期马克思主义基于对资本空间生产造成了地方和总体的矛盾以及消费主义文化盛行,他们不仅深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消费主义文化批判理论,而且提出了空间批判理论的新论题,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空间。以探索西方个人自由和解放为己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指认当代西方社会是一个总体统治社会的同时,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宣传的西方社会是一个无矛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的论调,认为西方社会是一个物质丰裕、精神贫乏、统治和压抑更加全面的异化的社会;指认西方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只不过其表现形式转化为社会发展日益总体化、一体化发展趋势与个人个性化自由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西方革命的潜能依然存在,革命的前提就是西方个人从被总体统治和支配的异化生存状态下解放出来,形成人的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基于以上认识,他们相继提出了总体异化理论、工具理性批判、技术批判理论、文化工业论、消费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大众媒体批判理论等,这些新的论题既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本性,又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联系;后马克思主义虽然揭示了当代西方社会出现的多元政治主体、多元政治运动、多元政治诉求等新变化,但他们的理论目的恰恰是为了解构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否定阶级政治的可能性,最终陷入抽象的话语革命的微观政治的错误中。

第三,对西方革命战略、策略的探索 and 社会主义理想的设计。除了后马克思主义认为西方革命不可能之外,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晚期马克思主义都认为,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但是,基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理解和对西方社会历史条件、传统文化的认识,他们既不赞同照抄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也不赞同建立像俄国那样的社会主义社会,认为西方革命应该探索适合西方社会历史条件和传统文化的革命战略与革命策略,进而建立一种适合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社会,并由此形成了他们的社会主义观。总体来看,他们强调西方革命应当采取包括文化心理革命、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总体革命模式。其中,如何开展文化心理革命是他们理论的重点,核心是要形成西方无产阶级成熟的阶级意识和西方个人的自主意识,培养西方革命的主体。以探求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自由和解放为目的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强调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通过意识形态斗争来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并力图处理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以探求西方个人自由和解放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主张以西方古典人道主义批判和对抗资本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并陷入脱离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片面强调文化意识形态斗争的乌托邦。在他们那里,尽管存在着实践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等各不相同的社会主义理想的设计,但其共同点是继承和发展西方的平等和民主传统,尊重无产阶级或个人的独立自主性,是不同于俄国的另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社会。

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社会历史条件和传统文化相结合,探索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结果的话,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的理论缺陷,则导致了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晚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回归,实现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转向。晚期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彰显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的正、负效应。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两次转向”既体现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提出了诸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与功能、文化批判理论、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技术理性批判理论、异化理论、空间批判理论、生态批判理论和解放政治学等诸多新的论题,是我们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处理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现代性问题的可贵的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 [1] 佩里·安德森. 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 高铨、文贯中、魏章玲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 [2] 乔治·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 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3] 卡尔·柯尔施.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王南湜、荣新海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9.
- [4] 乔治·卢卡奇. 卢卡奇自传. 杜章智编, 李渚青、莫立知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6.
- [5] 马克斯·霍克海默. 批判理论. 李小兵等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9.
- [6] 恩斯特·拉克劳, 查特尔·墨菲. 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 尹树广、鉴传今译.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 [7] 王雨辰. 晚年阿尔都塞对他的理论的反思与完善.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6).
- [8]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 辩证法的效价. 余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 [9]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 语言的牢笼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 钱俊汝、李自修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5.
- [10]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 政治无意识: 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 王逢振、陈永国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11] 特里·伊格尔顿. 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意识形态及其兴衰//斯拉沃热·齐泽克, 泰奥德·阿多尔诺. 图绘意识形态. 方杰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12] 戴维·哈维. 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 胡大平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 [13] 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 刘怀玉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 [14] 汪信砚, 陈思齐. 《共产党宣言》中的社会空间思想论析.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9).

On the "Two Shifts" in Foreign Marxism And Their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Wang Yuchen, Huang Junrong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Abstract The "two shifts" of foreign Marxism refer to the cultural shift of Western Marxism and the return to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in late Marxism. Western Marxism, opposing the economically determinist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emphasized the roles of praxis, dialectics, and cultural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history, leading to the cultural shift within Western Marxism.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ostmodernist thought, post-Marxism exploited the flaws inherent in this cultural shift, and moved towards an abstract cultural critique that completely detached from the determining role of the economic base and deviated fro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owever, late Marxism, upholding Marx's paradigm of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 political economy, conducted a comprehensive critique of late capitalist society, which not only deepened the cultural shift within Western Marxism but also marked the second shift in foreign Marxism.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essence of these "two shifts" in foreign Marxism not only deepens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developmental logic and theoretical nature of foreign Marxism, but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advancement of Marxist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Western Marxism; post-Marxism; late Marxism; second shift in foreign Marxism

■ 作者简介 王雨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 武汉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 湖北 武汉 430073;

黄俊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涂文迁